

讲谈社
兴亡的世界史

09 ▶ 09 WHAT
IS HUMAN HISTORY?

东印度公司与 亚洲之海

〔日〕羽田正 著
毕世鸿 李秋艳 译

十七、十八世纪，亚洲海洋是世界舞动的中心，
显微镜下的东印度公司，
既是公司，也是影响全世界的帝国。

东京大学副校长
著名世界史学家羽田正新编力作

北京·友声出版社

本书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把各国东印度公司同时纳入视野，进行了一个综合的“横向”研究，绘制出一幅更加全面的西方扩张和中西贸易图像，使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这些公司的异同，也能看到它们在世界历史上发挥了何种作用，在亚洲各地给当地的人和社会带来了何种影响。这本书值得一读。

——北京大学教授 李伯重

羽田正教授吸收了西方学者新的研究成果，围绕 17、18 世纪整体世界初步形成进行综合分析，不仅介绍了东印度公司兴起的背景，分析了它们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还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 17、18 世纪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及其影响。专业化的历史如何兼顾传统的社会功能是值得思考的。在笔者看来，《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最大的亮点在于，作者以极大的勇气书写了一本从专业的角度并非特别专业，但能为专家和普通人共享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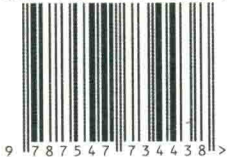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教授 向荣

理
想
国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ISBN 978-7-5477-3443-8



9 787547 734438 >

定价：84.00 元



讲谈社
兴亡的世界史

09 ▶ 09 WHAT
IS HUMAN HISTORY?

东印度公司与 亚洲之海——

〔日〕羽田正 著
毕世鸿 李秋艳 译

KOUBOU NO SEKAISHI DAI 15 KAN HIGASHI INDO GAISHA TO AJIA NO UMI

© Masashi Haneda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北京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01-2019-502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 / (日) 羽田正著 ; 毕世鸿,
李秋艳译. -- 北京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11
(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
ISBN 978-7-5477-3443-8

I. ①东… II. ①羽… ②毕… ③李… III. ①东印度
公司(英国) - 历史 IV. ①F755.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69319号

地图审图号：GS (2018) 6159号

责任编辑：许庆元 卢丹丹

特邀编辑：黄旭东 马希哲

封面设计：艾 藤

内文排版：李丹华

出版发行：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 65255876

总编室：(010) 65252135

印 刷：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9年11月第1版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 × 1092毫米 1/32

印 张：11.75

字 数：233千字

图 片：112幅

定 价：84.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推荐序

世界史视野中的亚洲海域

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活动，是集远洋贸易、跨文化交流和殖民掠夺为一身的多面故事，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高度重视并争论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东印度公司研究再掀高潮。但是，由于相关资料主要集中在东印度公司的母国，即英国、荷兰和法国，该领域研究一直是由西方学者主导的。在为数不多的由东方学者撰写的著作中，羽田正教授的《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是最新推出的，给人不一样的感觉。在笔者看来，本书有以下特点。

首先，采用了世界史研究的方法和路径。所谓“世界史”，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与传统民族史学不同的、以研究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联系为面向的历史。为了同过去的世界史，即外国史相区别，包括羽田正教授在内的史家又称晚

近的世界史为“新世界史”。世界史研究最早出现在美国和中国，但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跟进很快。杉山正明对以蒙古为代表的欧亚草原帝国的研究，羽田正对亚洲海洋世界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提出了“整体世界史观”。他将人类历史分为“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指出世界史研究侧重于后者，即人类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在论及本书的指导思想时，作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迄今为止的历史研究主要根据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以时间为轴来开展研究。这就是所谓‘纵向历史’研究方法。但是，针对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通过横切的方式来叙述世界整体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也就是所谓‘横向历史’研究方法的应用，至少在本书出版十年之前是很少有人尝试的。”《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力图以东印度公司为客体，构建 17、18 世纪“横向相连的‘世界史’”。

在西方史学界，“东印度公司研究”是一门显学。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东印度公司的活动被视为欧洲民族国家或帝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通过对外贸易和对殖民地的掠夺最大限度地获取财富，以达到国强国富的双重目的。随着战后欧洲殖民主义体系崩溃，东印度公司研究也从国家或帝国史框

架中解脱出来，成为纯经济史研究。借助国际贸易理论和计算机技术，以尼尔斯·斯廷斯加德（Niels Steensgaard）、柯提·乔杜里（K. N. Chaudhuri）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家对东印度公司贸易的性质和结构、交易体系、货物种类、长期趋势等进行了统计分析和专门化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些新问题并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比如股份制是东印度公司的制度创新，也是西方国家在亚洲海域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东印度公司运回的货物中，奢侈品所占比例不大，大宗货物如靛蓝、硝石、生丝和棉纺织品才是主要的；东印度公司不仅有官方贸易，还存在公司职员成规模的私人贸易。

与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相伴随，西方史学界也开始对19世纪大行其道的民族史学进行反思。在他们看来，这种狭隘的民族史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摆脱民族史学的局限，一些史家开始寻找超越民族国家的叙事单位。“文明”“海洋”等新单位应运而生。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是海洋史研究的奠基人。在1949年出版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他首次将地中海和周边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他认为在深层次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作用下，地中海世界不同文明同呼吸、同命运，即使腓力

二世时代基督教西班牙同伊斯兰土耳其之间的争霸战争也不能改变。受布罗代尔的启发，乔杜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从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研究转向对印度洋的研究。他认识到与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相比，印度洋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存在很大差异性，不同文明之间远未形成分享共同命运的局面。但是，印度洋世界仍然是一个整体。除了季风、移民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远距离贸易也发挥了重要的整合作用。这里很早就出现了以港口城市为中心的环印度洋商业网络，并形成了不同文明共享的商业文化。伊斯兰教的扩张、中国的强大影响以及 16、17 世纪美洲白银的流入进一步加强了印度洋世界的文化和经济联系。

羽田正教授吸收了西方学者新的研究成果，这些在本书中时有反映。但他关注的重点不是东印度公司的商贸活动，也不是印度洋和印度洋世界的统一性，而是“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兴亡来描述 17、18 世纪整个世界的变化”。在他看来，世界的一体化潮流始于 16 世纪以后，并一直持续至今。四百年间，受这股巨大潮流的冲击和影响，地球和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7 世纪英国、荷兰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伴随这股潮流相继成立，推动这股潮流向前发展，并最终随着世界

一体化的深入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本书不是对单个东印度公司的研究，也不是对东印度公司某一方面活动或影响的研究，而是围绕 17、18 世纪整体世界初步形成进行的综合分析。本书不仅介绍了东印度公司兴起的背景，分析了它们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还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 17、18 世纪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及其影响。除了常见主题如公司组织、商船、商路、商馆和货物之外，本书还包含移民、女性、混血儿、走私商等新内容。

其次，将日本纳入 17、18 世纪的整体世界，并寻找在其中的定位。在以往的东印度公司或印度洋世界研究中，日本都处于边缘地位。按照迈克尔·皮尔逊（Michael Pearson）教授加大的“印度洋世界”定义，该地区从好望角延伸到印度尼西亚最东端，上接中国南海。说该定义是“加大的”，是因为他加入了被过去定义所忽视的东非，并突出了中国的影响。尽管如此，日本仍不在此范围内。在本书中，羽田正教授将 17、18 世纪东印度公司活动所及的所有亚洲国家和地区都纳入考察范围，为此他使用了“亚洲之海”。所谓“亚洲之海”不仅包括印度洋，还包括中国的南海和东海。

为了突出日本在 17、18 世纪世界史中的特殊地位，羽田正

进行了比较分析。他首先将东亚海域与印度洋区别开来。他将“东亚海域”称为“政治之海”，由于明清中国和统一后的日本拥有强大的王权，东印度公司在这里的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欧洲人，包括东印度公司之前的葡萄牙人无法做到为所欲为。至少直到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还不是这一海域的主要势力；中国和日本政府，还有华商和水手才是推动这一海域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然后，他将日本同中国区别开来。日本在统一之前是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在东亚海域，这一秩序是通过朝贡贸易表现出来的。统一之后的日本试图挑战东亚秩序或从中摆脱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探索，日本建立了在以本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之上的海外贸易体制。这种新体制与欧洲体制十分相似，即拥有主权的政府负责管理“国家”的对外贸易。在他看来，19世纪后半期日本的“脱亚入欧”并非偶然。由此可见，作者书写世界史的最终目的是回答日本问题。

第三，回归宏大叙事，书写普通人能读懂的历史。传统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历史学都具有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好的历史作品亦文亦史，为普通人所喜闻乐见。在文艺复兴时期，历史是绅士教育的重要内容，具有陶冶情操，明辨是非，增长智

识之功能。到了启蒙时代，历史是思想家扫除愚昧、开启民智，构建知识和理性社会的利器。一部宏大叙事、雅俗共赏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让多少欧洲人看清了宗教的虚伪和不宽容。但是，在经历了19世纪的专业化之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变得越来越狭窄，离现实和普通人的需求越来越远。毫无疑问，历史学的专业化是必要的，但是专业化的历史如何兼顾传统的社会功能却是值得思考的。在笔者看来，《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最大的亮点在于，作者以极大的勇气书写了一本从专业的角度并非特别专业，但能为专家和普通人共享的历史。如同作者坦诚，这是一项有意义的综合研究，但难度很大。他说：“以一人之力来挑战如此庞大的主题难免失之轻率和鲁莽。笔者开始写作以来，面对如此困难数次感到挫败。但是，总要有人去挑战这一壁垒不可。现在人们需要一种将当今世界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理解的历史叙述方式。身为历史研究者的我应该直面此类课题。”

本书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让笔者困惑的是，作为日本“新世界史”的积极倡导者，本书作者并未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美国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在2002年出版的《西方历史思想手册》“新世界史”条目中指出，除了将跨文化交

流带入历史研究中心之外，新世界史最主要关心的是构建与欧洲中心论不同的历史理解路径。这并不是否认欧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而是否认将欧洲经验作为衡量其他社会发展的标准。本书恰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本书的核心观点是，17、18世纪欧洲东印度公司之所以能够在亚洲海域胜出，是因为它们是从统治领土的主权国家的世界中生长出来的；日本因为早在江户时代就形成了与欧洲主权国家非常相似的体系，因而能走上与亚洲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基于此，他批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中国和印度也看作‘国家’，并将其与欧洲各国放在同样的平台上来进行分析”。在笔者看来，作者赋予了欧洲形态的国家太多的重要性，而这正是新世界史和文明史、海洋史力图改变的。作者将17、18世纪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形态区分为对疆域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认为只有出现主权理论的国家才是主权国家，只有发展出人民主权概念的国家才是民族国家，这些都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笔者认为，至少17、18世纪的中国是领土国家、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这也是亚当·斯密在“论主权者或国家的收入”一卷中将中国和欧洲国家同等对待的原因。

行文至此，笔者不免有些惆怅。2007年，刘新成教授在为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中文版作序时说：“上世纪80年代吴

于廛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仁中得到广泛认同。但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起色。”从刘教授发表感叹至今，十多年又过去了。在此期间，日本的新世界史几乎从无到有，如今已经硕果累累，但我国的新世界史仍然没起色。在笔者看来，同20世纪80年代相比，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全球化”或“去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争论的焦点问题。因此，从横向联系的视角思考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变得更加迫切。面对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国的世界史工作者为什么几乎集体失声？这似乎与90年代中国史学的重新定向有关。王学典先生将中国近百年的史学争论归结为史观派与史料派之争。民国史学深受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影响，重视史料考订和小问题研究；从新中国成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史学重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大问题研究，史观派占支配地位；但八九十年代史料派复兴并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他说：“进入1990年代后，史观派的学术地位就越发无足轻重，乃至可有可无了。”因此，当国际史学界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影响，大力开展新世界史研究之时，中国史学却回到了民国，回到了乾嘉。毫无疑问，史料考订和具体问题研究是必须的，但重大理

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探讨也是需要的。笔者认为，史料与史观、具体研究与综合分析、学术探讨与现实关怀不是不可以调和的，处理得好还可以相得益彰。希望《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的出版能给中国史学界一些启示。

向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中文版序言

当得知拙著《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将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笔者深感荣幸，并对突破种种困难、勇于承担本书翻译工作的毕世鸿先生和李秋艳女士表示由衷的敬意。

在“兴亡的世界史”这一系列著作中，本书可谓“异端”。其他著作大多以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或清帝国等为研究对象，关注一个地区，并对该地区的帝国或国家的兴亡进行详细论述。与此相对，本书则将整个世界纳入研究视野，以不能称为帝国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这样一个组织为研究对象。这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历史研究方法。但是，对于本书所尝试的世界史的研究方法，笔者确信在今后的世界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历史学，其应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为了理解当今世界的特征，通过比较的视角来描绘过去所发生的历史。生活在

全球化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我们常常在不断意识到世界整体的同时，从事着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有鉴于此，在叙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之际，就有必要把世界整体的状态作为“世界史”来加以看待，并根据时代的不同来进行重现。就像中国史或日本史那样，迄今为止的历史研究主要根据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以时间为轴来开展研究。这就是所谓“纵向历史”研究方法。但是，针对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通过横切的方式来叙述世界整体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也就是所谓“横向历史”研究方法的应用，至少在本书出版十年之前是很少有人尝试的。通过将“纵向历史”和“横向历史”这两种方法进行巧妙的组合，我们就能够将世界整体的过去作为“世界史”，继而获得立体的、综合性的理解。在本书中，笔者通过关注东印度公司这一客体，尝试着挑战17世纪到18世纪这一“横向历史”的难题。这一挑战是否成功，留待各位读者来进行评判。

迄今为止，关于西欧各国设立的数家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已经有数部欧美或日本的著作进行了研究。但这些著作基本都只是关注一家公司，并非同时将数家东印度公司的组织及其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很多著作只是站在欧洲国家的立场上来叙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对此，本书在注意到上述共同点和不同点

的同时，将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同时纳入视野，从总体的角度来描述这些公司在世界史上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与此同时，对于东印度公司在世界各地给当地的人和社会所带来的诸多影响，也试图从地区的角度来进行解读。当然，由于本书原版的读者大多为精通日语且接受过日式教育的群体，本书特别考虑到日本的视角，书中使用大量篇幅来关注日本或亚洲各国的历史，并由此展开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本书还采用了大量图表和数字来进行说明，希望读者能够关注个人的人生，并能够对过去的事务抱有具体的印象。

本书执笔之时，迄今正好十年，当时笔者尚未和中国或中国学者正式开始交往。在撰写本书之后不久，笔者即有机会访问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的城镇。从数年前开始，笔者和中国历史研究人员之间的接触增多，亦有很多机会交换研究的心得和信息。自2015年末至2016年初，笔者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访学，这使得笔者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并对中国历史研究人员的研究视角和论述方法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如果换作现在，笔者在本书中对于中国历史的论述可能也会出现些许不同。不管怎样，笔者还是希望中国的各位读者能够理解十年前的日本历史研究人员如何竭尽全力接近新的世界